

鲁迅与《文学与革命》关系的 一份新材料引发的思考

白海君

【作者简介】白海君,鞍山师范学院文学院(邮编 114005)。

【原文出处】《鲁迅研究月刊》(京),2018.12.36~45,52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鞍山师范学院(2015)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1920年代中期鲁迅思想状况研究”阶段性成果。

在鲁迅的思想脉络中,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占有重要的位置,因历史与政治的规限而一直没有得到足够深入的拓展研究。20世纪末以来学界再次重视二者关系,但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更多限于运用二者言论和论述做引述做对比以证明鲁迅受托洛茨基影响的事实。这种论述自有其相当的学术价值,但经本文考证,鲁研界在二者的接触时间上判断有误,而且也没有将其置于整个思想发展脉络上进行深入解释。如果结合1920年代的中国历史场、文学场和鲁迅的思想状况,可以发现问题复杂得多。一直以来,鲁迅清醒地将自我定位为一个“中间物”,一个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者和清理者,一个过渡时代和转型时代的过渡型知识分子,而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为他反观自身提供了别一种思考视角。

一、鲁迅与托洛茨基关系的一份新材料的说明

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是苏联高级领导人对社会主义苏联文化建设时期文学艺术理论做系统思考的重要文本。根据其序言,本书原分“当代文学”和“前夜”两部分。第一部分也即现在常说的《文学与革命》,是作者于1922-1923年间写成的文学现状评论文章,并先后在《真理报》上发表过,共八章。第二次出版时加上第九章,包括“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再版序》和《论文学和俄国的政策》。第二部分题为“前夜”,为作者写于1907-1914年间的23篇文

章。1923年苏联红色处女地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做了大量的补充和修改。1925年7月日本学者茂森唯士根据第一版译成日文,鲁迅于8月26日即购得此书。1925年8月26日日记:“晴。上午往邮局汇日金二十二圆。往东亚公司买《革命と文学》一本,一元六角。”同书在当年的书账中记:“文学と革命一·六〇 八月二十六日”。1928年2月23日又购同一版本一本,当日记:“晴。午后寄还静农小说稿。下午得静农信,十五日发。漱六、小峰、曙天、衣萍来。晚往内山书店买《文学と革命》一本,二元二角;《世界美術全集》第一本一本,一元六角五分。”其间的1927年9月11日还购有英文版预赠廖立峨,当日日记:“在商业书店买英译《文学与革命》一本,泉七元,拟赠立峨”。

笔者查当月日记,鲁迅与廖立峨相见十次,而1925年以来的鲁迅诸多关于革命文学的表述、与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战中都可以见到《文学与革命》的理论逻辑和概念影响的痕迹。此书英文版题为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译者为 Rose Strunsky,1925年伦敦和纽约同时出版(New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只是纽约版扉页有托洛茨基给ラコフスキー(拉·考斯基)的颂词。无论是日文版还是英文版,都是对前八章的翻译,即“当代文学”部分。1927年初始,韦素园、李霁野从俄文原文翻译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

在翻译过程中向鲁迅请教并借日译本以比较,但日文版已被冯雪峰借走,因此其译文后记中有请冯雪峰译出部分注释的说明。

期间和此后,有数个译文,情况如下:

1926年樊仲云译出《文学与革命》第六章“无产阶级的文化和艺术”。1926年3月17日出版的《文学周报》第216期有《论无产阶级文化与艺术》[俄]脱洛斯基著仲云译、3月21日第217期和4月4日第219期分别有续译。

1927年,孙伏园主编的汉口《中央日报》(又称中央副刊)上还由傅东华和樊仲云合译出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的序言、非十月革命的文学和论无产阶级的文学化和艺术。傅东华(译为杜洛茨基)以《文学与革命》为题把“序言”和“非十月革命的文学”分八次连载于《中央副刊》3月25日的第4号到4月2日的第12号上。樊仲云(译为脱洛茨基)署名仲云,“论无产阶级文学与艺术”分六次连载于6月10日的77号到6月17日的83号上。在期间的4月6日第16号上,樊仲云还译出《英国的将来》。

1928年2月韦素园、李霁野译《文学与革命》为“未名丛刊”之一。

1960年王凡西根据1957年9月纽约罗素书店的英文版全译当代部分,1971年由香港信达出版社初版。

1992年6月,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刘文飞、王景升、季耶三人据苏联红色处女地出版社1923年第1版译出的全译本,这也是国内第一个完整的译本。

显然,《文学与革命》对鲁迅的思想尤其是文学思考有深远影响,此为鲁研界共识,也是史实,但经本文考索,发现将二者关系的发生记自1925年8月26日所购茂森唯士译日文版《文学と革命》并不符合史实,而二者发生关系的桥梁和时间都另有实证。

《文学与革命》对鲁迅的重要性从鲁迅对之之重视可见一斑。他曾于1926年7月21日为胡敦译的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作后记时,参考并全译《文学与革命》中的《亚力山大·勃洛克》一章附在卷首。鲁迅在《乌合丛刊和未名丛刊》广告介绍中并没有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而在1927年4月9日给李霁野的信

中则提出对之有良好的期望。“未名丛刊”共十一种,除韦丛芜译《格里佛游记》外,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其它八本都是苏俄理论和著作,包括《苏俄的文艺论战》《白茶》《罪与罚》《往星中》《穷人》《外套》《十二个》《小约翰》。如此看来,想必是因为《十二个·后记》和《亚历山大·勃洛克》的译文引起鲁迅和李霁野的极大兴趣,并且在此书的中译和校对过程有鲁迅不少的汗水。其后直到那篇著名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为止,《文学与革命》中的概念和表达方式在其许多文章中都有显现。朱正在《现代中文学刊》上著文《鲁迅和〈文学与革命〉》^①,几乎摘录所有鲁迅与托洛茨基表达相似的言论以证明二者的密切关系。该期同时还刊载长堀祐造的《鲁迅革命文学论中的托洛茨基文艺理论》、张广海的《鲁迅阶级文学论述的转变与托洛茨基》,不过对二者关系发生的时间和联系的桥梁依然定在1925年8月26日所购茂森唯士译的《文学与革命》。

根据本人的检索,鲁迅与托洛茨基发生关联最早应是1924年12月,而且第一位搭建桥梁的人并不是茂森唯士,而是昇曙梦。昇曙梦其人,不做详介,只就其与托洛茨基有关系之处介绍。

1924-1926年、即大正13年-15年,日本新潮社出版了由昇曙梦编的七册《新ロシアパンフレット》:

1. 赤露見タママの記 1924年10月11日鲁迅日记为“往东亚公司买《近代思想十六講》、《近代文艺十二講》、《文学十講》、《赤露見タママの記》各一部,共同泉六元八角。晚得伏园信。夜H君来。”

2. 革命期の演劇と舞踊 1924年12月19日日记“东亚公司送来《革命之演剧与舞踊》一本,价泉六角也”书账革命期の演劇と舞踊一本〇・六〇

3. 新ロシア文學の曙光期 1925年1月6日日记“往东亚公司买《新俄文学之曙光期》一本,《支那馬賊裏面史》一本,共泉二元二角。”书账〇・六〇

4. 新ロシア美術大観 1925年3月5日日记“晚往东亚公司买《新俄美術大観》一本”书账〇・七〇〇

5. プロレタリア劇と映画及音楽 1926年7月5日“夜东亚公司送来《新露西亜パンフレット》二本,

《現代文豪評伝叢書》四本,共泉八元二角。”

6. 第二新ロシヤ美術大観书账同记,并价格为二·六〇

7. 無産階級文學の理論と実相 1926年7月19日“夜东亚公司送来《バイロン》一本、《無産階級文學の理論と實際》一本、共二元二角。”书账记为《新俄パンフレット》一本,〇·八〇

其中作为第二编的《革命期的演剧与舞蹈》是1924年6月15日由日本东京新潮社发行。目录为:

1. 革命期のロシヤ演劇 2. 舞臺装置の革命 3. 新劇運動の三権威 4. 演劇革命の跡を顧みて(ルナチャールスキイ) 5. 新經濟政策初期のモスクウア文壇 6. ロシヤ最近の舞踊 7. 舞踊劇の新しい収穫 8. 革命芸術と社会主義芸術(トロツキー)

该著目录中文笔者译为:

1. 革命期的俄国演剧 2. 舞台装置的革命 3. 新剧运动的三个权威 4. 回顾演剧革命的足迹(卢那察尔斯基) 5. 新经济政策初期的莫斯科文坛 6. 俄国最近的舞蹈 7. 舞蹈剧的新收获 8. 革命艺术与社会主义艺术(托洛茨基)

此著的最后一章正是托洛茨基所著《文学与革命》的第八章,即《革命艺术与社会主义艺术(托洛茨基)》,细目为:

日文:社会主義の停滞か最高の力学か、革命芸術の写実主義、ソウェート式喜劇、旧悲劇と新悲劇、芸術と技術と自然と、人間の再改造

译文:社会主义的停滞还是最高的力学、革命艺术的写实主义、苏维埃式喜剧、旧悲剧与新悲剧、艺术与技术与自然、人的再造。

托洛茨基的原著第八章目录小标题为:“人間の再改造(实在的和假想的)”,而茂森唯士译本在“人的再造”之前的约1800字共五段前加了小标题:“建筑与雕刻”(建築と彫刻)。

李霁野的译本第八章目录则为:

革命的与社会主义的艺术:社会主义下较大的动力。革命的艺术底“写实主义”。苏维埃喜剧。旧的和新的悲剧。艺术,技术与自然。人底再造。通过对比可知,李霁野的译文虽然在目录上有出入,

又与其他译文相区别,但却是原文完整的译文。(因本人不懂俄文,且俄文初版极为稀有,笔者是根据刘文飞等人据1923年红色处女地初版本译本。)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鲁迅是通过异曙梦的“新俄丛书”比较完整地了解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苏联共产党人关于文学和文化的论述的。其中有许多完整的章节内容,详细介绍了当时的苏俄文坛现状和相关政策。除此之外,还有《俄国文坛印象记》(《赤露見タママの記》)、《新俄文学的曙光期》(《新ロシヤ文學の曙光期》)中的“新俄文坛的右翼与左翼”和“俄罗斯诗坛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等章节,只是没有将苏共党内文艺界论争介绍到日本。从这个目录上看,鲁迅重视1925年任国桢编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且此译作的确引起了鲁迅的评价和对俄苏文艺界的关注。鲁迅在《〈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中指出,译介国外文艺理论及其论争的现状的重要性:“不独文艺,中国至今于苏俄的新文化都不了然,但间或有人欣幸他资本制度的复活。任国桢君独能就俄国的杂志中选择译文论三篇,使我们借此稍稍知道他们文坛上的论辩的大概,实在是最为有益的事,——至少是对于留心世界文艺的人们。”^②

这种评价,不仅符合他一向关注世界思潮和文坛的意愿,更与192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主义苏联给世界和人类未来带来的新的可能性有关,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期知识分子的命运有关。《苏俄的文艺论战》中所收瓦浪斯基的《认识生活的艺术与今代》和瓦勒夫松的《蒲力汉诺夫与艺术问题》中的许多论述都与鲁迅的生活认识、文学经验和思想路径有密切的关联。

瓦浪斯基与托洛茨基有许多相似的理论。转型期的作家和过渡型文人在革命的时代可以有什么样的努力和作为,那些在世界观上还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身负人类和民族传统文化重担的作家文人将起到什么作用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特别是,中国这样封建传统强大的空间中生存的中国作家应该如何处之,这些问题都成为鲁迅思考的重要内容。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从整个人类的

文化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高度，高屋建瓴地对此类问题有所论述。特别是就成长于革命前的旧作家、忠实于生活和自由生命的作家，如何在革命和新时代条件下保持自己创造力和进入新时代有系统的论述。

鲁迅最先接触的第八章“革命的艺术与社会主义的艺术”是《文学与革命》全书的落脚点，也是托洛茨基的最终追求。而前面的“非十月革命的文学”“同路人”文学和“未来主义”的论述，多是以十月革命和新经济建设时期为大历史背景，认为无产阶级文化/文学事业，必须既承认文化的继承性，又要强调社会主体和知识人的改造：“制服自己的感情，把本能提高到意识底高度，使本能透明，把意志底线伸张到隐蔽的幽暗处，因此把自身提高到一种新的平面上，创造一种较高的，社会的，生物的典型，或者你要高兴，就称之为超人。”“更正确地些说，共产的人底文化的建设和自我教育要封闭在其中的壳，将要现代艺术底一切有生命的元素都发展到最高点。人将变得无限量地强些，聪明些，精深些；他底身体将变得更为和谐，他底运动更有拍节，他底声音更有音乐的。”^③

因此，对鲁迅来说，《文学与革命》所追求的新的文化和新人，只有在革命成功后的社会主义时代才可能真正的实现。作为其准备和过渡的革命时代，学习和成长都是必然的过程，无论作家提出什么理论或者口号，都只能作为“中间物”而成为社会主义历史实现的准备。革命的时代和建设时期，全体国人都忙于对旧世界的反抗和新经济的建设，而无暇进行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学/文化建设，即使有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及其实验，也只是为未来社会主义文化的出现做准备。

在那个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作为“中间物”的旧作家将会有怎样的命运，无论是“同路人”作家还是自称获得了“无产阶级意识”，转换了阶级的创造社作家，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会成为新时代的主人吗？我在思想和心理上是否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灵魂深处是否依然遗留着旧传统的幽灵和对之的依恋？

面对1920年代的中国，各党派和文化团体纷纷提出救国济世的理论和文化主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党的国家主义，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等等，各知识团体或附其论，或自立门户。论争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以其史所未有的冲击力和逻辑力得到传播并征得了更多的民众。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但是也机械地将经日本改造过的阶级斗争理论移植到中国，否定历史的连续性和传统的承继性，忽略了新姿态下旧因素的同时，也忽略了革命和意识形态领域同盟军的必要，直到党从民族和文化的需要出面并成立左联为止，其宗派性和狭隘性都对第一代五四人造成不小的伤害。在众多五四人中，唯鲁迅正面回击，从自己的经验教训出发，既承认自己的有限性，又清醒地进行自我定位，并且扩而广之地坚持批判潜隐于旧我的思想和心理深处的封建思想元素。在这个意义上，厨川白村、有岛武郎、片上伸等人的相关论述则对现代知识人的自我反观和启蒙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鲁迅看来，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为解决生存于中国空间的、忠实于生活和生命的、向往自由和革命的作家角色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厨川白村问题的延伸与克服：

《文学与革命》的新思路

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和社会文明批判文本，在关于文学的理解、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和知识人的绅士性和生命力的创造性等方面都有许多启示。对于作为具有浓厚思想家特色的作家的现代知识人而言，保持精神世界和思想生命的鲜活的内在努力和更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仅要不断地克服传统的羁绊，还要保持与民众生活的血肉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克服知识人自身的国民劣根性和绅士性是个问题。如果说，启蒙主义是我启你蒙，那么厨川白村在生命主义的影响下指出，不仅启蒙对象需要启蒙，而启蒙主体更需要进行自我反观和改造。一方面，他批评民众因社会苦、劳动苦、人生苦而造成的苦闷所养成小市民气、村绅气性格和愚蠢蒙昧状态；另一方面，强调现代知识人应该以世界近

代人性思潮和追求生命自由的内在驱动力改造启蒙民众的同时进行自我生命力的更新和再造。鲁迅则在很长时间里自觉或不自觉地批判中国民众的国民劣根性,而忽略了启蒙者自我的再启蒙和再改造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出了象牙之塔》和《走向十字街头》正是厨川白村实践这种努力的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的文本。

几乎同时和稍后,《文学与革命》进入鲁迅的视野。这是托洛茨基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思考革命文化的性质、文化同盟军、传统与党的文艺政策之间关系的著作。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苏联文坛形成几个重要的文学派别。来自旧俄的“同路人”文学提供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他们新的社会和新的时代中无法确立自己的合理位置。当时拉普提出“无产阶级文化论”理论,否定传统文化及其载体的旧俄知识人的价值和意义。“列夫”派和无产阶级“岗位”派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实验。未来派、超现实主义派和形式主义派、大胆探索新文学艺术形式甚至有脱离现实基础而走向神秘主义的倾向。围绕着《列夫》《那巴斯图》《真理报》展开激烈的讨论。当时公认的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瓦浪斯基、托洛茨基以及各派作家和理论家都有相关文章。任国桢选译数篇结成的《苏俄的文艺论战》是中国较早地介绍当时苏俄文坛各派文艺主张的书。“列夫”派代表褚沙克、捷捷克等人主张:“艺术不是认识生活的方法,是创造生活的方法”^④。“纳巴斯徒”派的罗托夫、瓦进、烈烈威支等人主张:“艺术有阶级的性质,艺术有宣传某种政略的武器。无所谓内容,不过是观念罢了”^⑤。而托洛茨基和瓦浪斯基等人则主张,艺术既有客观的内容,也是认识生活的方法,艺术家以美学的眼光表现出艺术的价值^⑥。鲁迅在《前记》中肯定其意义,不过也显出他的不满足于“大概”,何况早已经通过异曙梦对当时的俄苏文坛有所了解。也就在这一年,创造社出现集体转向,批判前期的唯艺术论的同时批判鲁迅、郁达夫、叶圣陶等第一代五四人,又提倡无产阶级文学。问题是所谓革命文学家的“批判”和“清算”却是把文学

与政治革命斗争混为一谈,或借力阶级斗争,或只以激烈的口号,结果是革命文学并没有显出其本质和力量。既未能促进革命斗争,也于文学没有什么贡献,所以他们的“批判”和“清算”,对鲁迅而言,“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⑦。

纵观鲁迅的论战文章,难见什么唯物史观或阶级斗争之类的理论话语,却刀刀中的。鲁迅于1925年开始大量购阅并译介俄日相关论著却并不以之为利刃,而在作品和文章中强调封建因素批判的任务之繁难。他不再一味地对老中国子民进行批判,而是指出,现代知识人也要改革国民性,革命者血液中依然留存着封建残余,真正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人还没有出现之前,如果不能正视这种情况,革命是不能成功的。鲁迅指出:“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依旧,全不行的。”^⑧

改造国民性,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自身在内。革命是对旧有社会秩序的暴力推翻和文化重建,流血、牺牲、破坏和建设纠缠在一起,但是革命并不是以杀人和制造恐怖为目的,革命文学也同样不应以批判和清算为目的,每一个个体在革命的时代和建设的时代都应该有活下去的权利。鲁迅批判革命文学提倡者的可怕:“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⑨

鲁迅之所以给予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和蒲列汉诺夫以很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并没有以阶级斗争而统领所有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作为有着高瞻远瞩领导视野的革命者、艺术家和批判家的他们,并没有机械地套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更没有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学理论直接移植到比较特殊的文学艺术领域。托洛茨基不仅是“革命家和武人”,而且是“深解文艺的批判者”^⑩。他们都同样重视文艺规律,承认“同路人”及其作品存在的历

史和社会价值。政党的思想指导和政治政策应该允许他们的存活,并加以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改造。

《文学与革命》是托洛茨基综合当时苏俄文坛各方意见,系统思考十月革命前后如何面对文化和文学传统而写作的专著。虽然其中有政治上基于其“不断革命”论而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取消论,但是对十月革命前后的“同路人”文学和各派别的批评依然有许多真知灼见。

《文学与革命》一书的第一部分即“当代文学”共分八章。

第一章 十月革命以前的文学

第二章 十月革命底文学“同路人”

第三章 亚历山大·勃洛克

此三章都是对十月革命以前更多背负精神负担而追求生活的本真和生命的自由的作家作品的评论。不但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而且从文化的传承性指出,文化传统的历史价值,而且明确地判定作为文学“同路人”中最有成就并与革命关系最为密切的勃洛克长诗《十二个》不是革命的诗,他们只是被迫接近革命的作家,是更多地有着农民性色彩,而不是工人无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世界观的革命作家。

第四章 未来主义

在许多艺术流派中最具有革命性的一派。

第五章 诗歌底形式派

这是对当时欧洲和俄国正处于兴盛期的形式主义理论的评析,由于他们强调语词的探源和结构的独立而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对,并指出其神秘感和断裂论。

第六章 无产阶级的文化与无产阶级的艺术

第七章 共产党对艺术的政策

第八章 革命的与社会主义的艺术

此三章是基于其政治上的“不断革命论”深入探讨了作为政治上的过渡时代和文学文化上的过渡时代的特点,特别是提出作为刚刚取得政治统治权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文艺政策来促进革命文化的学习、发展和创造的问题。从文化的根本性质而言,无产阶级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事业,

但是并不是在短暂的现在,而是在经过了相当的学习、借鉴和思想提升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之后。一切都是过渡的时代,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理想是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的实现,能否实现的根本在于无产阶级主体的确立。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就是思想和精神世界的无产阶级化,即将人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

托洛茨基关于“同路人”的论述,其实是在其完整而宏大的“不断革命”论视野下的思考。新时代和新社会已经和正在到来,也就是鲁迅说的“大时代”,但面对这个“大时代”,“同路人”也罢,鲁迅也罢,将会是怎样的命运呢?无论是创造社还是“现代评论”派成员,都自称掌握了公理、民主或革命的真理,但这都不过是革命低潮期文人的消极选择,离革命、真理和无产阶级远得很。实际革命者的革命并没有这样的喧嚣,而是默默地革命和流血才能创造出一个大革命的时代。而在托洛茨基那里,革命却是“革命的几何学”或“革命的代数学”,鲁迅深感“在我自己,觉得中国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许多为爱的献身者,已经由此得死。在其先,玩着意中而且意外的血的游戏,以愉快和满意,以及单是好看和热闹,赠给身在局内而旁观的人们;但同时也给若干人以重压。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①

“生”和“死”的指向是哪类人,早已在鲁迅的思考视界之内。能够表现/表达这个“大时代”的时代精神的才是革命文学,自称转变而无革命文学佳作者未必可以成为新时代意义上革命文学家。郑振铎在《文学与革命》一文中所引费觉天的信:“我们理想的革命文学决不是现在的一般作家,而是崛起于灾难中的诗人或小说家。”^②提倡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太阳社作家的转变,并不是在血的革命实践和对马列主义理论有完整理解的基础上的化合,而且这种“变与不变,总写不出好的作品来的”^③。的确,19世纪中晚期以来,革命和战争是中国的常态。洋务派、维新派,或者辛亥革命都具有某种程度的革命意味,历史地比较,只有鲁迅同政治领域的孙中山

一样,他是对革命有深刻而完整理解的人,正如王际所说:“鲁迅只是在过去所有生机蓬勃、广有影响的伟大的作家都是革命者这一意义上,堪称为一个革命者。”^⑩

三、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文学与革命》的场域

托洛茨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不仅有社会时代的原因,还以中国知识人在1920年代思想和心理准备为前提。五四运动时的历史主题是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1920年代的历史主题是社会革命而不是文学革命。在周氏兄弟胡适等人看来,五四的思想革命任务远未完成,可以造成新式革命的主体也并没有培养出来。1922年以来,复古思潮愈演愈烈,北京思想界和文化界开始分化。首先,太平洋社和创造社实现合作并创办《现代评论》杂志,其后,新月社、新月书店成员多欧美留学人员和学院教授,他们大力提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法律等自由主义的同时又主张国学整理、学术救国。部分左翼或马列主义化的创造社成员则批判旧式文人,作为新文学重要代表的鲁迅也成为他们首要批判对象,鲁迅也主动与之展开论战。1928年的文化围剿几乎可以说是必然发生的事件。结合《现代评论》杂志创刊的复杂历史,可见1920年代中期鲁迅的批判指向。自始以来,他既对近代以来英美式的民主和自由有所批判,又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评论多不表现民众的“醒而且真”的生命与精神提出警告。“醒而且真”的“真的文学者”和生活的观照者一向就少有,鲁迅在新的知识青年和新的战士的培养过程中有这样的体验:“我从前竭力帮忙,退让,现在躲在孤岛上,他们以为我精力都被他们用尽,不行了,翻脸就攻击。其实还太早了一些,以他们的一点破碎的思想的力量,还不能将我打死。”^⑪然而,自己被抛弃的痛苦,却少有人体会。

受托洛茨基及其文学理论影响的中国知识人并不少。如郑振铎、瞿秋白、冯雪峰、蒋光慈等人的思想中都有痕迹。他们在五四前后即提出改造社会,并于1919年8月1日创办“尽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⑫的《新社会》杂志。1920年8月5日创办旨在“敦促一般人的觉悟”的《新社会》的续刊《人道》月刊。1919

年11月1日创办旨在“想着另创一种新生活”“本科学的研究,以促进社会改革之动机”^⑬的《曙光》。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等人在此时的知识界提供了另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这种思路在1920年代中期以后对中国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发生也有不小的影响。

李大钊于1919年1月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首次将托洛茨基(译为陀罗慈基)介绍到中国,引用《Bolsheviki与世界和平》一书中的211个字。其后郑振铎于1920年《曙光》1卷6期译载托洛茨基的一篇政论《我们从什么着手呢?》^⑭。此文是作为苏联领导人之一的托洛茨基对全俄民众——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提出有组织、有计划、有热情地投身于苏维埃社会主义生产的演讲。虽然文章只有1120余字,但是也展现出当时初期苏俄所面对的困难和党的领导人和人民万众一心欲建立一个新社会的热情和渴望。其后则在《新社会》和《曙光》上大量刊发了关于社会改造的主张和具体措施的文章。

瞿秋白也是其中的成员,由于他其后的政治生涯和文学创作而具有代表性。中国知识阶级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和林德杨自杀事件都成为他早期关注的问题。他认为:“真正的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本着他的精神去随时随地牺牲,就能一方面自己解放,一方面自己改造。而且从他的牺牲而所做的社会运动,影响于别人时候,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解放,真正的改造。”^⑮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和《时事新报》共同特派记者前往苏联,并在途中写游记《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1921年6月22日他出席并报道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其后还于7月6日见到了列宁并向中国读者第一次介绍了列宁。在游记中他详细描绘对当时红色苏联革命领导人、俄国人民的不畏艰辛的劳动精神和对生活的热烈关爱的形象,并且常常以中国社会现状作对比。特别是以之为参照思考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其后瞿秋白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革命活动,并于1933年4月作《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杂文的

思想史价值做历史定位。而在之前的1932年译有《高尔基创作选集》，其中有卢那察尔斯基作的原序《作家与政治家》一文。此译文的中心内容便是指出，一切文学家都是政治家，而无产阶级文学则不再像其他统治阶级一样掩盖和否定自己的政治性，而是公开自己的政治意图。因此，在瞿秋白看来，鲁迅并不是苏联文学意义上的没有经历革命，不完整地了解革命的“同路人”，而是不断地成长为革命战士的革命作家。但是，他在遗稿《多余的话》中却又把自己塑造为另一种形象：“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而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位置。”^②

这种表述与他在革命时期的言行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在论述中表达出绅士阶级身上的封建意识并不能够因为读了多少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便能够轻易得到清除，反而因之可能暂时遮蔽了个体思想和精神问题的严重性。虽然瞿秋白不是第一个将鲁迅定性为“同路人”和同盟军的中共党员，但时任党中央书记的他却是党内最高文化领导人，有资格代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意见。而且可以认定的是，瞿秋白对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各方面的政治和文化意见有相当认识和理解，其文化领导权的地位在当时比较稳定的。虽然瞿秋白与鲁迅相见已是1932年12月11日晚，但二人相见恨晚。鲁迅对瞿秋白的重视可从编辑出版《海上述林》可见一般的。如果从鲁迅本就对共产党有相当好感和希望能够从重要文化领导人那里了解相关的文化政策之意的角度来看，是可以成立的。对当时的鲁迅而言，他对诸多党派已经绝望，唯有共产党还有某种吸引力和神秘感。从这个意义上，自己如何被评价，当然是他关心的问题。另一位给予鲁迅“同路人”评价的共产党员冯雪峰的观点值得探讨，只是，冯雪峰似乎更多地以学生和诗人的身份出现在鲁迅的面前。

最早明确给以鲁迅可争取的“同路人”称号的是冯雪峰。他于1928年5月写成，发表于1928年9月

25日《无轨列车》第2期上的《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是第一篇明确地定位鲁迅为“同路人”的文章，只不过文中并没有使用“同路人”而是“革命追随者”的概念^③。作为鲁迅学生辈的湖畔诗人冯雪峰很快思想左倾，1926年还首次拜访鲁迅，并帮助韦素园和李霁野根据茂森唯士的日文版《文学与革命》做注释。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28年任义乌城区书记，在左联五烈士牺牲之后调任左联党团书记。他出身世家，与鲁迅关系密切，在寓居虹口、拉摩斯公寓时与鲁迅有相当深入的思想交流。《革命与知识阶级》明显地受托洛茨基的文学理论的影响。由诗人进入到革命队伍的学生身份的冯雪峰，有责任也有必要对鲁迅这样具有革命意识的知识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给以表述。

《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把中国的知识阶级分为两类：“其一，他决然毅然的反过来，毫无痛惜地充去个人主义的立场，投入社会主义，以同样的坚信和断然的勇猛去毁灭旧的文化与它的依赖的社会。其二，他也承受革命，向往革命，但他同时又反顾旧的，依恋旧的；而他又怀疑自己的反顾和依恋，也怀疑自己承受与向往，结局是他徘徊着，苦痛着。”^④

冯雪峰看来，虽然鲁迅与无产阶级及其革命有一定的隔膜，“但无论如何，我们找不出空隙，可以断言鲁迅是诋谤过革命的。”^⑤此文写于革命文学论战正酣之时的1928年下半年，明显地对创造社和太阳社围剿鲁迅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在文章结尾指出，这种攻击不但不利于革命，反而显出其“狭小的团体主义”和“将不是诋毁革命者强要当作诋毁者”的危险，因此主张：“革命有给与知识阶级的革命追随者以极少限度的闲暇，使他们多渗透革命的策略与革命的精神的必要。”^⑥冯雪峰对鲁迅的思想状况和精神上的把握，既有过来者的感受，也有从党的立场上试图团结一切有利于革命的力量思考。其实在冯雪峰写作此文之前，鲁迅写有《关于知识阶级》并译有青野季吉的同名文《关于知识阶级》等思考知识阶级的文章，而且他本人对苏联文坛有相当的了解。既有对《文学与革命》的体会，也有鲁迅的表述，同样也有亲自译的《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译稿以《新俄

的文艺政策》为题)的启发。此书是藏原惟人和外村史郎译的包括《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的讨论会记录、第一届无产阶级作家全联邦大会1925年的决议《观念形态战线和文艺》，1925年6月18日由俄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并在7月1日的《真理报》上发表的《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三个部分。根据芦田肇的时间推算，冯雪峰与鲁迅的译文没有关系，且在写作《革命与知识阶级》之前已经通读过日文版《文学与革命》。^⑤

四、结语

《文学与革命》是较早系统论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对文学艺术态度的经典文献。此著作在中国知识人中译介传播者中，除鲁迅外多为共产党员。对于鲁迅而言，该著作不仅在实际效果上克服自己和厨川白村的理论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他本人对其认识也有逆向思考和启发的过程，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革命时代旧知识人(“同路人”)的评价。作为身兼文人和中国共产党员身份的冯雪峰和瞿秋白，与鲁迅一样，政党对待知识人的政策和知识阶级转换的思考都有自身的体会和苏联的参照。比较而言，鲁迅更多地是从一个经验丰富、感觉敏锐的生命意识出发来思考旧作家(旧知识人)与革命的关系问题。

注释：

①朱正：《鲁迅和〈文学与革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李辉凡：《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苏联文学联刊》1993年第3期和王中忱：《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3期。

②鲁迅：《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褚沙克等著，任国桢译：《苏俄的文艺论战》，北新书局1925年初版，本文引自1927年3月再版(下同)。

③[俄]特罗茨基著，韦素园，李霁野合译：《文学与革命》，上海鲁迅纪念馆编：《李霁野文集补遗》(上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425页。

④⑤[苏联]褚沙克等著，任国桢译：《苏俄的文艺论战·小引》，第5、6页。

⑥参见[苏联]褚沙克等著，任国桢译：《苏俄的文艺论战·小引》，第6-7页。

⑦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上海《萌芽月刊》

1930年3月1日，第1卷第3期。收《二心集》。

⑧鲁迅：《书信·250331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470页。

⑨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初刊于1931年10月27日和8月3日上海《文艺新闻》第20期和21期，初刊时只有三千多字，修改后七千余字收入《二心集》。

⑩鲁迅：《十二个·后记》，勃洛克著，胡教授译《十二个》，北新书局1926年版。

⑪鲁迅：《尘影·题辞》，黎锦明：《尘影》，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初版。

⑫郑振铎：《文学与革命》，《文学旬刊》第9期，1921年7月30日。

⑬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初刊于1931年10月27日和8月3日上海《文艺新闻》第20期和21期。

⑭王际真著，陈圣生译：英译本《鲁迅小说选导言》，《鲁迅小说选：阿Q及其他》，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1年版，第144页。

⑮鲁迅：《书信·270102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2卷，第1页。

⑯郑振铎：《新社会·发刊词》，《新社会》第1期，1919年8月11日。

⑰《曙光》月刊宣言，1919年11月1日。

⑱原名为“What Should We Begin With?”，登于1920年4月19日基辅Kiev出版的《劳动周报》(Trudovaya Nedelia)。1920年6月12日《苏维埃俄罗斯》周刊(Soviet Russia)曾译载，郑振铎重译。

⑲瞿秋白：《社会运动的牺牲者》，《新社会》旬刊第8号，1920年1月11日。

⑳瞿秋白：《多余的话》，何乃生编：《坦荡人生——瞿秋白随想录》，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160页。

㉑冯雪峰：《革命与知识阶级》，1928年9月25日《无轨列车》第2期。“同路人”=“革命追随者”。俄语为 лоптчиц 形容词则为 лоптчий 日语为‘同伴者どうはんしゃ’，有同行者，跟随者，追随派之意。蒋光慈也在《俄罗斯文学》中也使用“革命的同伴者”。“同路人”一语因鲁迅的翻译和韦素园李霁野的中译本《文学与革命》而得到广泛应用。

㉒㉓㉔冯雪峰：《革命与知识阶级》，1928年9月25日《无轨列车》9月号，署名：画室。

㉕[日]芦田肇：《冯雪峰“同路人”理论的接受与形成——〈革命与知识阶级〉管见》，吴俊编译：《东洋文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00页。